

中经要报

国家信息中心

第 28 期 (总第 961 期)

2015 年 7 月 20 日

要 目 导 航

本期推荐..... 2	降 国内外车企竞争加剧..... 12
政府和社会资本合作模式顶层设计构想... 2	国内财经..... 13
国际财经..... 8	积极政策支撑二季度经济回暖 下半年经济或 将好于上半年..... 13
伊朗核协议正式达成 原油市场面临冲击.. 8	京津冀协同再造新北京 通州升级北京行政副 中心..... 15
外需及个人消费疲软 日本下调 2015 年经济 预期..... 8	国企改革年内再提速 顶层设计即将出台.. 17
希腊议会通过“以改革换救助”法案..... 9	国务院六大措施促进外贸增长 推全国一体化 通关..... 19
海外媒体看中国..... 10	观点精粹..... 21
英国《金融时报》：中国散户持股不到总市 值 5% 不宜被夸大..... 10	赵坚：未来铁路投资重点不在高铁 而在通勤 铁路..... 21
英国《路透社》：中国即将推出的人民币国 际支付系统再打折扣..... 11	杨涛：中国消费金融体系建设需要做好风险 控制..... 22
美国全国广播公司财经频道：中国应汲取教 训继续推进改革..... 11	刘兴国：解决央企亏损问题是一项艰巨任务 需多方合力解决..... 23
美国《华尔街日报》：中国市场新车销售连	

本期推荐

政府和社会资本合作模式顶层设计构想

刘健 张帆

为在基础设施等领域提供优质高效的公共服务，世界各国主要采取了完全依靠政府投资和运营（公有化）、完全通过市场机制（私有化）以及通过政府和社会资本合作（Public-Private-Partnership，即 PPP 模式）三种方式。从实施效果看，PPP 模式既能充分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又能更好地发挥政府作用，最终提升公共服务的供给质量和效率，受到了世界各国和国际组织的普遍关注和大力推广。

一、完全“公有化”或“私有化”方式的理论和现实缺陷

（一）政府投资运营公共服务的缺陷

一是政府的资金预算约束限制了基础设施等领域的投融资空间。政府投资运营公共服务的资金主要来源于税收或举债，而举债主要依靠未来的税收偿还。但基础设施领域往往投资金额大，单纯依靠政府提供将带来巨大的财政支出压力，政府投资的空间和潜力受到很大限制。并且基础设施的建设环节资本性支出大，后期运营环节资本性支出较少，造成政府支出在年度间波动较大，不符合公共财政支出的代际公平原则。二是政府部门在投资运营管理上不具备比较优势。政府部门主要承担国家经济、社会宏观管理职责，其组织架构和人员技能的优势也集中在宏观管理领域，与私营部门相比，对于基础设施设计、投资、建设、运营管理等具体事务，政府部门天然不具备优势，难以保证公共服务供给的质量和水平。

（二）在公共服务领域存在市场失灵

基础设施等公共服务领域由于自然垄断等原因，存在市场失灵，不能完全依靠市场这只“看不见的手”。一是基础设施领域初始投资大、回收期长，具有规模经济和范围经济特征，容易造成自然垄断，通常在有限时期内被一家企业主导。如果垄断企业可以自由定价，则有动力通过高于边际成本定价、减少公共产品供给来获得垄断租金，损害消费者福利；如果要求垄断者按照边际成本定价，则由于初始投资过大，垄断企业可能难以实现盈亏平衡，无法保证长期稳定地提供服务。二是基础设施等公共服务是公共产品，具有很强的正外部性，容易产生搭便车行为，整体效用难以完全内化在市场机制中，无法有效地界定需求函数，单纯依靠市场将造成供给不足或需求过度。

国外实践情况对上述理论作出了验证。20世纪80年代，英国撒切尔夫人、美国里根总统上台后，掀起了私有化浪潮，对基础设施进行大规模民营化，世界银行等国际组织也积极倡导私有化改革，甚至鼓励将基础设施完全交由市场运作。实践表明，尽管私有化在提高公共服务方面发挥了一定作用，但随着时间推移，暴露出了诸多弊端，如私人部门过度追求利润，导致公共产品价格高企，难以保障公益性，政府的退出并未带来基础设施大发展，反而造成了基础设施供给不足。

二、PPP模式提供了基础设施供给的解决思路

在完全依靠政府或市场都无法保证基础设施等公共服务的供给质量和效率的背景下，个别国家开始探索创新运用PPP模式，综合市场和政府的各自优势，发挥市场“无形的手”来设计、建设、运营和维护公共服务设施，运用政府“有形的手”进行规划和监管。20世纪七八十年代，为缓解财政支出压力，提高运营效率，土耳其率先应用建设-移交-运营（BOT）模式，在合作期限内通过“使用者付费”方式引导私人部门参与基础设施建设。随后，许多发展中国家开始在交通、水利等经济基础设施建设领域应用PPP模式。到了20世纪90年代，英国政府提出了PFI模式（Private-Financing-Initiative，私人融

资计划)，在合作期内通过“政府付费”的方式支持私人部门提供公共服务，PPP 模式的应用范围进一步扩大到学校、监狱、医院、图书馆、政府办公大楼等社会基础设施领域。PFI 模式在国际上得到了推广。

从本质上看，PPP 模式是政府向社会资本购买服务，即政府采取竞争性方式择优选择具有投资、管理能力的社会资本，双方按照平等协商原则订立合同，由社会资本承担提供公共服务的具体职责，政府部门负责公共服务的价格和质量监管，并依据公共服务绩效评价结果，以运营补贴、项目本身商业开发收益、让渡经营收费权、投入存量资产等方式向社会资本支付对价，保证其获得合理收益。从项目回报机制看，PPP 模式包括政府付费、使用者付费和可行性缺口补助等三类支付方式。从运作方式看，PPP 模式主要包括委托运营（O&M）、管理合同（MC）、建设-运营-移交（BOT）、建设-拥有-运营（BOO）、转让-运营-移交（TOT）、改建-运营-移交（ROT）等形式。

从机制原理看，PPP 模式的机制设计充分发挥了政府部门和社会资本的各自优势，提高了公共服务的供给质量和效率。一是物有所值（Value-for-Money），在实施前对项目全生命周期内的成本和风险进行定性和定量评估，只有在优于传统政府投资模式下才采用 PPP 模式，避免项目盲目上马和资源浪费。二是风险分担，发挥比较优势，按照“风险由最适宜管理的一方承担”的原则分配项目风险，让双方承担各自擅长控制的风险，纠正政府部门和社会资本方的短视行为，社会资本一般承担设计、施工、融资、运营、财务等风险，最大限度激发社会资本方的活力和创造力，政府部门一般承担政策、法律、需求等风险。三是竞争性采购，政府一般与两个以上的优先投标者进行谈判，通过投标人之间的竞争压力获得谈判优势，择优引入信誉好、有实力的运营商。四是项目实施公开透明，依法公开充分披露项目实施的相关信息，保障公众知情权，接受社会监督，减少暗箱操作带来的各种违法违规行为。五是有效的政府监管。政府部门专注于对公共服务服

务质量和价格进行全生命周期监管，并拥有价格调整、信息要求、限制或强制行为等规制权力，以确保公共利益最大化。

三、PPP 模式推广运用面临的挑战

从理论上讲，PPP 模式的关键是科学合理设计激励约束机制。PPP 模式属于委托-代理问题，即政府部门作为委托人，社会资本作为代理人，政府委托社会资本提供公共服务。委托-代理面临的最大难题是信息不对称，委托人必须掌握成本函数和需求函数才能计算出产品的最优价格，但在实践中这两方面的信息优势都掌握在代理人手中，社会资本对生产过程掌握的信息比政府部门更多更全，即使政府部门能够获得生产成本相关信息，也不清楚社会资本在降低成本提高效率上做出了多大努力。因此，PPP 模式政府和社会资本合作的关键是，在信息不对称的条件下，如何订立激励相容的合同，确定合理的回报，支付合适的购买价格，确保社会资本有激励有动力去控制生产成本，改进公共服务质量和效率。

从国内实际看，政府和社会资本的合作需要公平竞争的市场环境和重诺履约的法治环境，对政府治理水平提出更高的要求。一是在合作合同签订前，要求建立竞争性的筛选机制来选择社会资本，降低项目整体成本。但过往地铁、轨道交通、环保、市政工程等领域市场化程度不高，地方割据、市场不流动，一直被称作关系市场，劣币驱逐良币的情况较为突出，有实力和优秀的企业很难长大。二是在合作合同签订后，要求政府和社会资本双方按照合同办事，社会资本按合同提供服务，政府按合同支付对价。但国内个别地方政府契约意识薄弱、信用记录差，社会资本与政府发生争议时难以通过法律途径得到解决，由于自身合法权益缺乏法律保障，社会资本参与 PPP 项目积极性不高。

四、构建有利于 PPP 模式发展的机制和制度

（一）理论与实践相结合，合理设计 PPP 项目激励约束机制

在设计 PPP 模式的激励约束机制时，为解决信息不对称，实现有

效的激励约束，除了进一步强化信息披露和政府监管之外，可借鉴经济学家的理论研究成果。

一是按照拉丰-梯若儿模型原理，设计 PPP 项目的补贴支付机制。首先，要求社会资本在投标环节充分披露生产成本的信息，揭示自身成本类型，提出成本补贴需求，剔除低效企业，在初始筛选环节择优选择社会资本。其次，政府和社会资本要根据预计的成本收益情况，事前确定补贴支付规则。在前期建设环节，政府提供土地使用权、存量固定资产等一次性固定补贴，在后期运营环节通过事先确定公共服务标准和关键绩效指标，政府基于项目表现付费，以此激励社会资本提高运营效率。

二是按照迭代模型原理，设计 PPP 项目的价格调整机制。设立价格监管周期，在一个监管周期内，社会资本可以按照上期约定的规则获得经营收益或补贴，一个监管周期结束后，政府部门对上个周期的成本收益情况进行论证，并在下一个价格监管周期中进行相应调整，前期已获得超额利润的将在下一个周期降低价格或补贴，前期遭受经营损失的将在下一个周期提高价格或补贴，但在一个价格周期内，社会资本仍按照事先约定的规则获得回报。

三是按照纵向一体化原则，社会资本对 PPP 项目实施全生命周期管理。在传统政府投资模式下，基础设施项目的设计、建设和运营环节分别由不同承包商执行，三个环节彼此脱节存在信息不对称，上游环节（设计和建设）对下游环节（运营）产生了负的外部性，设计和建设方不知道运营环节的具体需求，增加了后期运营与前期设计建设之间的磨合成本。PPP 模式采取全生命周期合作理念，通过纵向一体化，将上下游企业之间的外部性内部化，通过以运营商为核心选择社会资本，社会资本介入项目设计、建设、运营、维护的全过程，发挥全生命周期管理的优势，提升项目整体运营效率。

（二）推动政府治理水平现代化，打造有利于 PPP 发展的法律制度环境

一是推动 PPP 相关立法，营造稳定的法律环境。目前，我国在 PPP 领域缺乏统一、高层级的立法，PPP 项目实施管理框架、财政管理制度、监督管理体系均有待进一步明确，制约了 PPP 健康发展。同时，现行法律法规规定的争议解决机制不完善，对社会资本保护不足。通过推动 PPP 立法，打破社会资本进入公共服务领域的各种不合理限制，鼓励国有控股企业、民营企业、混合所有制企业等各类型企业积极参与提供公共服务；规范政府和社会资本的责权利关系，明确争议解决机制，保障社会资本的合法权益；明确政府相关部门的监督管理责任，切实维护公共利益最大化。

二是完善 PPP 政策制度体系，确保关键环节实施管理到位。第一，制定符合 PPP 模式特点的采购管理办法，择优选择社会资本合作伙伴。与传统政府采购货物、工程和服务相比，PPP 项目采购在适用范围、采购流程规定、评标方法和谈判方面存在特殊性及区别，要创新符合 PPP 模式特点的采购方式，既评价采购成本，也要综合评价社会资本的服务提供能力，规范采购的程序和方法，维护国家利益、社会公共利益和政府采购当事人的合法权益。第二，统筹论证 PPP 项目的财政承受能力，保障政府的履约支付能力。要对项目涉及的政府支付责任进行识别、测算和评估，纳入年度预算和中期财政规划进行管理，确保政府在长达二三十年的合同周期内严格履约，保障社会资本的合法权益，解除社会资本的后顾之忧，同时，也可避免政府支出责任过大加剧财政支出压力，维护财政中长期可持续性。（刘健系财政部金融司巡视员，张帆系中国人民大学财政金融学院在读博士研究生）

国际财经

伊朗核协议正式达成 原油市场面临冲击

7月14日，伊朗与六国集团（美国、英国、法国、俄罗斯、中国和德国）达成协议，从而结束长达12年的伊核谈判。依照协议，伊朗将减少98%的浓缩铀库存，拆除2/3用于铀浓缩的离心机，未来10年不生产浓缩铀，未来15年不建造新的重水反应堆。这意味着伊朗发展核武器的路径将被阻断，作为交换，国际社会将会放松对其制裁，伊朗将重返国际原油市场。一位伊朗石油部副部长此前曾表示，在制裁取消后，伊朗的石油日出口量将增长100万桶，原本就供过于求的原油市场竞争将更加激烈。首先，石油输出国组织（OPEC）内部竞相增产的行为会更加普遍，产出高于上限将成为常态。在国际油价低迷的情况下，OPEC成员国都将占有市场份额作为主要目标，增产现象十分普遍，近期沙特、伊拉克和阿联酋的原油日产量均创历史最高纪录。6月OPEC石油产出达到每日3128万桶，较3000万桶的上限高出近130万桶。伊朗是OPEC成员之一，在伊朗以最大产能回归后，OPEC产出高于上限将成为常态。其次，伊朗将亚洲作为优先出口地区，未来该地区的原油出口将更加激烈。伊朗扩大对亚洲原油出口的意愿得到了亚洲买家的积极回应：日本5月购买量较上年同期增加5%至每日190,924桶；韩国进口量接近翻倍；印度进口量同比大增66%，至2014年3月以来最高位。新增伊朗原油涌入，可能会动摇沙特作为亚洲最大海外原油供应国的地位，也将对俄罗斯原油构成竞争。最后，国际油价将面临长期下行压力。制裁解除的时间表意味着伊朗庞大的石油储备将从2015年末逐步重返市场，并且在投资带动下供应量日渐增加。在全球经济增长缓慢，石油需求增长有限的情况下，国际油价可能将在50-60美元区间长期徘徊。

外需及个人消费疲软 日本下调2015年经济预期

7月15日，日本央行宣布维持货币政策不变，同时下调了对通胀及经济增速的预期。通胀方面，日本央行将2015、2016、2017财年核心CPI（除去生鲜制品）的增长率均下调0.1%，分别为0.7%、1.9%及1.8%；经济增速方面，日本将2015

财年 GDP 增速由 4 月预期的 2% 下调至 1.7%。2016 财年、2017 财年 GDP 增速分别为 1.5% 和 0.2%，与 4 月预期相同。市场分析认为，疲软的外部需求及个人消费是此番下调的主要原因，显示日本经济复苏前景不容乐观。就外需而言，日本 5 月出口增长 2.4%，为连续第二个月下滑，低于预期的 3.5%。中国和美国方面的需求减弱成为拖累日本 5 月出口增速下滑的主要原因。日本财务省数据显示，5 月日本对中国出口增加 1.1%，较 4 月 2.4% 的增幅显著放缓；5 月日本对美国的出口较上年同期增加 7.4%，不过增速要远低于 4 月的增长 21.3%，日本对美国的出口量为六个月来首度减少。就个人消费而言，其疲软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首先，个人消费信心不足。日本内阁府 7 月 10 日公布的数据显示，经季节性因素调整，日本 6 月份消费者信心指数为 41.7。虽然这一数值已经是今年以来的最高值，但仍远低于 50 的景气线，表明居民对增加消费的前景悲观多过乐观。其次，实质薪资连续下滑，无法支撑消费增长。长期以来，日本劳动力不足，其就业市场的工作机会多于求职人数，然而这并没有带来薪资水平的上涨。日本厚生劳动省公布的数据显示，5 月经通胀调整后实质薪资按年意外下降 0.1%，为连续第 25 个月下降，成为拖累消费的重要原因。最后，日元贬值带来的食物涨价效应可能抑制家庭消费。2015 年以来日本食品大范围的涨价，涨幅在 3-10% 不等，这将不可避免地影响日本家庭开支。长期来看，在收入难以实现上涨的情况下，日元贬值将对日本家庭消费增长起到负面影响。

希腊议会通过“以改革换救助”法案

7 月 13 日，希腊总理齐普拉斯最终选择妥协，与欧元区领导人达成债务问题解决协议，接纳了比之前更为严格的改革措施换取了欧元区领导人向希腊提供第三笔援金的承诺。希腊议会 16 日通过一揽子“以改革换救助”法案，为希腊获取第三轮救助贷款创造了条件。根据法案，希腊将彻底改革该国增值税体制，全面改革养老金和废止提前退休，而债权人则同意在希腊履行上述承诺后向其提供 860 亿至 870 亿欧元的救助资金。目前，希腊最迫切需要的是敲定 70 亿欧元的过渡性融资协议，该协议是避免希腊真正违约最后防线，7 月 20 日希腊对欧洲央行的 35 亿欧元债券将到期。在 7 月 20 日以前，欧洲央行将决定是否向希腊金融系

统注入更多援助资金，德国联邦议院也将就是否与希腊重启救助谈判举行投票。目前来看，希腊违约风险暂时缓解，但是前景仍不乐观。一方面，希腊国内的政治风险升高，不排除未来出现动荡。希腊公務员工会和药店业主 15 日举行了全国性罢工，反对新救助协议。在议会投票前，约 1 万名工会成员及左派政党支持者在议会大楼外举行反紧缩集会。在这次议会投票中，希腊总理齐普拉斯领导的激进左翼联盟党 149 名议员中，有 32 人投了反对票、6 人投了弃权票、1 人缺席。分析人士认为，大量执政党议员倒戈将使执政联盟今后推动相关法案变得更加困难，齐普拉斯可能会改组内阁甚至提前举行大选。在希腊银行仍然停业、救助资金尚未到位的情况下，任何政治动荡都有可能让希腊重新面临风险。另一方面，希腊和债权人之间政治互信崩塌，此次救助法案通过对希腊来说只是权宜之计，不排除未来背弃承诺，改革再次停滞。希腊和债权人之间重建信任依然任重道远。

海外媒体看中国

英国《金融时报》：中国散户持股不到总市值 5% 不宜被夸大

一直以来，中国股市的几宗罪中，得到的认可最多的就是投机性过强、上市公司不分红等等，而这些“罪”的原罪常被归因于散户过多：散户多所以羊群效应强烈，追涨杀跌格外突出，换手率超高，股市大起大落、快起快落的特征十分突出；散户多所以难以建立起一支强大的市场力量，难以建立起有利于投资者的市场环境。数据似乎为散户驱动市场假说提供了论据。今年第二季度，新开股票账户数量达到 3800 万，而 2014 年全年仅为 900 万户。这给外界造成的印象是，散户资金正在汹涌杀入 A 股市场。然而，个人可能开有多个账户。个体市场参与者现共有 9100 万人，但截至今年 6 月底，只有 5100 万人的股票账户中持有股票。截至今年 6 月底，在股市所有个人投资者中，21% 的投资者持有股票市值不足 1 万元人民币，而 69% 的投资者持有股票市值不超过 10 万元。由于 A 股总市值高达 46 万亿元，这意味着，超过 2/3 的投资者所持股票市值总额不足总市值的 5%。另一方面，占投资者总数仅为 0.1% 的 71400 名投资者持有 1000 万至 1 亿元市值的股票，还有 4400 多个股票账户持有股票市值超过 1 亿元。尽管这些账户登记为

个人，但此类投资者几乎不可能是外界普遍想象的新手。很显然，从资金总量上来看，散户并非股市中的主导力量，将股市暴涨暴跌归因于散户的羊群效应就有些偏颇。但从博弈论的“声誉模型”延展来看，只要有少量的非理性局中人参与博弈，重复博弈中理性局中人就很可能“假装”成非理性局中人。就是说，只要在有少量散户存在的市场下，机构很可能也会“模仿”散户追涨杀跌的操作方式，从快涨快跌、大涨大跌中获利。

英国《路透社》：中国即将推出的人民币国际支付系统再打折扣

去年人民币跨境支付系统(CIPS)因技术问题未能如期启动。据悉，中国预计将在今年稍晚启动该系统。中国政府本希望把 CIPS 打造为全球人民币支付的高速公路。该系统的设计初衷是取代原本各自为战的支付网络，降低处理人民币支付交易的难度。中国仿照支持美元交易的 CHIPS 系统设计的 CIPS，料将提升人民币作为国际贸易结算货币的地位。环球银行金融电讯协会(SWIFT)5月时公布，人民币成为亚太地区与中港跨境支付最大货币，而在 2012 年时还仅排第五位。CIPS 的推出将使中国境外企业与中国企业直接以人民币结算，减少支付环节。近期中国股市下跌使其它中国金融基础设施建设计划的推进受到影响。CIPS 的用途较先前设想打了折扣，仅用于跨境人民币贸易结算，并不包括资本相关交易。这样一来，数以十亿美元计的交易势必要推迟，包括证券购买和外商直接投资，这些交易本来打算通过该系统进行。在美国，通过类似系统的交易规模每日将近 1.5 万亿美元。目前来看 CIPS 系统充其量只是为目前零星散落全球的中国结算银行进行人民币贸易结算提供一个补充。该支付系统将通过一些额外功能，比如让 CIPS 与欧美工作时间有一些重叠，使得在中国开展业务的大型外企能以更快的速度结算支付。虽然 CIPS 不太可能对 SWIFT 银行支付系统构成威胁，但将逐步替代相应的中资清算银行目前在离岸人民币中心使用的同类系统。澳新银行驻香港的分析师 Raymond Yeung 指出，CIPS 是支持上海在 2020 年之前成为全球人民币结算中心的一个重要基础设施，它的推迟或者缩小规模可能拖慢这一进程。

美国全国广播公司财经频道：中国应汲取教训继续推进改革

如果想让股市走高更具可持续性，中国应承诺以下三项举措：首先，重新致

力于开放金融市场和深化资本市场改革。限制外国投资者直接投资 A 股市场，加上中国居民投资机会有限，导致股市中散户投资者比重过大且保证金投资者不够成熟，加剧了市场的波动和当前的危机。去年中国宣布将推进一批金融改革，截至目前已取得部分成果，应该继续坚持下去。其次，中国必须减少政府干预让更多的企业自主成败。近期重点是资本市场，不过中国信贷市场也需成熟化，其中一项是允许中国企业（包括国企）拖欠债务支付。2014 年 3 月以来，少数几家公司已被允许债务违约。尽管债券持有人可能对此不乐意，但应当对这种违约持欢迎态度，因为这是中国金融市场进一步成熟的标志。最后，集中精力推进国际多边开发机构倡导的更广泛改革。如采取措施为私营部门创造有利环境，一个重要标志是强化法治、提高透明度和加强问责制等。从长期看这一承诺符合中国上市公司的利益，对培养投资者长期信任和信心也是必不可少的。

美国《华尔街日报》：中国市场新车销售连降 国内外车企竞争加剧

大多数汽车制造商预测，2015 年中国的销售能有较高的一位数百分比的同比增长，现在看来，这种观点有些过于乐观了。2015 年 6 月，中国的新车销售出现了罕见的下降。中国汽车工业协会数据显示，6 月的轿车销售同比下降了 3.4%，是 2012 年 9 月以来第三次出现同比下降。前两次下降是由于长假造成的，而本次下降则有着更广泛的预警信号：中国的经济在放慢、股市下跌、汽车产业产能过剩。中国汽车工业协会常务副会长董扬表示，经销商调查显示，经销商接待顾客数量“今年上半年大幅下降”。今年上半年，大多数汽车厂商的销售增长都出现了放缓。中国经济减速使这个行业的问题上升到了一个新高度，因为中国的销售已经占到了大众和通用汽车等国际大厂商全球净利润的一半。厂家负责人和分析人士预计，过去一年来的减速会加剧国际厂商和国内厂商在中国的竞争。加拿大皇家银行资本市场公司分析师约瑟夫·斯帕克表示，中国的需求明显在放慢，供应过剩问题伴随着正在酝酿的价格战，但目前的销售形势可能会有助本地厂商从那些在中国有合资生产厂的跨国厂商那里抢得一些份额。英国艾尔西汽车市场咨询公司驻上海的分析师约翰·曾说，中国市场调整远还将经历较长时间。

国内财经

积极政策支撑二季度经济回暖 下半年经济或将好于上半年

国家统计局发布数据显示，上半年国内生产总值 296868 亿元，按可比价格计算，同比增长 7.0%；二季度 GDP 同比增速为 7.0%，与一季度持平，好于市场预期；环比增速为 1.7%，虽低于近三年均值 2.0%，但较一季度明显回升。这反映出，去年年末以来政府采取的一系列刺激措施帮助经济企稳。同时公布的固定资产投资、工业增加值、零售销售等数据均出现回暖迹象。1-6 月份，固定资产投资同比增长 11.4%，与 1-5 月持平；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同比增长 10.4%；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 6.3%。二季度经济显著回暖 统计局表示，国民经济运行处在合理区间，主要指标逐步回暖，呈现缓中趋稳、稳中有好的发展态势。6 月的经济数据出现全面持稳回升的局面：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 6.9%，较上月的 6.1% 大幅回升；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同比名义增长 10.6%，增速比 5 月份加快 0.5 个百分点，环比增长 0.96%；固定资产投资 6 月环比增长 0.88%，上半年逐月下滑的态势有所企稳。此前公布的进出口增速也双双超预期，出口同比增速四个月来首次转正，为 2.1%，进口降幅则为年内最小，收窄至 6.7%；6 月的信贷数据也回暖，央行并未公布 6 月新增人民币贷款数据，据测算，6 月人民币贷款大幅增加 1.28 万亿元，分别较上月和比去年同期多增 3805 和 1968 亿元，创近年同期新高；6 月社会融资规模为 1.86 万亿元，仅次于 1 月份的 2.05 万亿元。招商证券宏观团队分析，二季度经济数据显示总需求水平持续回升。出口增速由负转正，投资增速止住跌势，消费稳定增长，需求状况回稳推动供给端持续扩张。资金投入的增加使得 6 月基建投资增速升至 20.6%，较 5 月回升 5.6 个百分点。居民收入的稳定增长有助于消费支出的持续扩张。上半年全国居民人均消费支出同比增长 7.7%，较一季度回升 0.4 个百分点。可见，基建投资加速和消费增长稳定是国内经济企稳的主要拉动力量。华创证券债券组齐晟、屈庆分析，第三产业增速为 8.4%，贡献度较高；6 月社会消费品零售增速上升至 10.6%，同时上半年最终消费支出对 GDP 增长的贡献率为 60.0%，比上年同期提高 5.7%，以上两个数据与中国经济处在转型期的宏观经济背景是一致的。同时，工业增速大幅好转，连续

三个月回升，为上半年单月最高值，明显高于市场预期。金融数据显示信托贷款+委托贷款融资有增长的迹象，判断地方融资需求有所上升，而基建投资单月同比增速上升至 20.6% 验证了这一判断。民生宏观点评，经济回升的主要动力来自第三产业，第二产业仅增 6.1%，比一季度进一步下滑，显示传统工业去产能压力仍大，第三产业从 7.9% 大幅回升至 8.4%，预计和牛市带动金融业收入增加以及房地产销售回暖有关。下半年好于上半年是大概率事件 国家统计局新闻发言人盛来运表示，下半年延续上半年缓中向好的走势可能性比较大，下半年经济增长好于上半年“也是大概率事件”，“我们有信心、有能力能够实现预期增长目标”。这主要是因为上半年出台的政策措施效应还将继续发挥。投资方面，上半年投资计划的项目，从审批到转化为实际投资和生产力有释放过程，效应也有持续释放过程；房地产二季度出现明显回暖态势，将对相关行业产生拉动；改革红利继续释放。中金公司首席经济学家梁红此前预计，未来 2 到 3 个月，经济增速有望进一步企稳，并于三季度末至四季度呈现温和复苏态势。受益于今年 4、5 月份以来货币政策的持续放松，GDP 环比增速的回升有望在三季度最为显著。招商证券宏观团队预计，三季度 GDP 同比增速小幅回升至 7.1%。齐晟、屈庆分析，整体上看，6 月数据呈现出工业、投资、消费、房地产全面改善的状态，结合外贸数据的好转与金融数据的超预期，判断经济底部已经形成。后期在地方政府债务置换后地方投资增加和房地产市场好转的带动下，经济有望继续企稳。而如果地方投资和房地产能够持续发力，也有助于工业增速的好转。北京大学经济研究所常务副所长苏剑则认为，消费占比提高意味着中国经济结构持续优化。但是进出口数据仍然不容乐观，全球经济与中国经济都比较低迷的情况下，下半年中国贸易方面仍然会处于出口受阻、进口需求不足的情况。预计在投资方面，下半年政府或采取一些保增长的措施。总体来说，下半年经济增速很难有大的提高，能提高到 7.1% 就很不容易。民生宏观也认为，由于前两个季度占比只有 45%，能否保住 7% 还要看下半年，目前看压力不小。一方面房地产下行、制造业产能过剩、出口增量有限的中长期背景没有改变，传统经济依然有下行压力；另一方面，6 月股灾后牛市预期受到影响，IPO 放缓，交易萎缩，这些都会影响金融业对 GDP 的拉动，

而这是上半年回升的主要力量。**政策将发力支撑稳增长** 民生证券宏观分析师朱振鑫表示，最近政策托底基建的态势明显，先后有包括 40 号文保在建工程、允许借新还旧、企业债不许违约和 PPP 加速签约等一系列政策支持。基建在政策托底下略有回升，成为投资企稳的主要力量。全年要达到 7% 的目标，下半年稳增长还要继续发力。下一步央行宽松将更加重“质”而不是“量”，主要是通过降准、定向宽松等方式降低长端利率，疏通货币政策向实体的传导渠道。从财政政策看，财政收入和土地出让金下滑依然是最大束缚，下一步主要是通过加快 PPP 项目签约和城镇化基金扩容来解决融资问题，预计下半年基建投资将明显回升。目前财政部正在对 10 个省市的 23 个 PPP 示范项目进行督导，以保证 PPP 示范项目质量，抓紧形成可复制、可推广的实施范例，充分发挥示范效应。苏剑认为，在财政政策方面预计还是会继续扩张，方向主要还是基础设施方面。因为基础设施建设投资是和“一带一路”、京津冀一体化等国家战略捆绑在一起的。货币政策方面，6 月的信贷数据回暖，新增人民币信贷和社会融资规模双双创下年内次高水平，显示货币条件略显回暖，以及救市已采取过相关措施，未来央行将继续维持“中性”的货币政策态度不变，短期内降准降息可能性降低，货币政策将注重定向调整，比如定向降准或者使用 MLF、PSL 操作等，注重货币对实体经济的支持。

京津冀协同再造新北京 通州升级北京行政副中心

7 月 10 日至 11 日召开的北京市委十一届七次全会通过了《关于贯彻〈京津冀协同发展规划纲要〉的意见》，确定了北京贯彻协同发展国家战略的时间表和路线图：北京按 2017 年、2020 年、2030 年三个时间节点，部署四个方面目标任务：疏解非首都功能、提升首都核心功能，控制人口规模、治理北京“大城市病”，创新发展、建设国际一流的和谐宜居之都，提高区域协同发展水平。**控疏结合解决北京“大城市病”**会议指出，有序疏解北京非首都功能，是京津冀协同发展的关键环节和重中之重。解决北京“大城市病”、优化提升首都核心功能，必须以疏解非首都功能为先导和突破口，要坚持“控”与“疏”双管齐下。在“控”方面，要制定更加完善严格的产业限制目录和人口调控目标，坚决守住各类功能禁止和限制底线，严格控制新增人口；在“疏”方面，要遵循疏解规律，把握节奏，加

强配合，协调好利益关系，使疏解工作有序有效。《人民日报》评论称，有序疏解非首都功能，北京才能落实好城市战略定位。这是京津冀协同发展的关键环节和重中之重，也是破解北京“大城市病”的根本之策。此外，《京津冀协同发展规划纲要》中明确了北京2300万的人口控制目标，这是“必须坚决守住的底线”。统计数据显示，2014年末北京市常住人口2151.6万人，比上年末增加36.8万人。5年时间，北京市常住人口增加了近180万人。港媒报道称，北京市政府已经开始转移人口，将批发市场迁出北京，并对无户口儿童在京上学采取了一些限制措施。安邦智库分析，在未来京津冀三地发展中，北京将主要扮演“瘦身者”的角色，不仅要向外疏解非首都功能，还要疏解人口与部分产业。因此，北京市未来将面临较大的调整，尤其是在主城区，这种调整有可能会伤筋动骨、消耗元气。未来如何平衡中央、地方与个人的需求，平衡行政方式、市场方式与社会方式，对北京市来说都是一场考验。**通州将成北京“行政副中心”**会议称，要聚焦通州，深化方案论证，加快北京市行政副中心的规划建设，2017年取得明显成效。7月14日，北京规划委明确表示，将有序推动北京市属行政事业单位整体或部分向市行政副中心转移。首都经贸大学教授文魁表示，北京市政府搬离城区，不仅可以缓解中心城市的人口压力，也能带动通州地区的快速发展。在国内，杭州等城市采取这种搬迁方式加快新区发展，都取得了较好的效果。中国社科院城市发展与环境研究所原所长牛凤瑞认为，部分北京政府机关搬过去后，对通州经济有促进作用，同时，通州不会聚集大量人口，因为即使部分机关搬过去，这些机关单位人员的家属未必搬，所以对土地空间的需求可能没那么大。北京市规划委主任黄艳介绍，未来的通州将是一个独立的新城。重要的前提是要加强轨道交通的建设，区域快轨将实现与机场、周边新城、周边河北区域的便捷联系。北京市社科院副院长赵弘表示，建设北京市行政副中心，要认真总结北京中心城发展的经验教训，进行前瞻性规划，提高规划的刚性约束，不能随意改变规划，一张蓝图绘到底，防止“摊大饼”式扩张；在交通方面，要提早规划轨道交通，建设副中心内部的轨道交通网络体系，提早谋划，做到规划引领人口产业布局；一定要留下永久的农田、绿地，预防新的城市病，真正体现生态绿色发展理念。**全市规划面临大调**

整 随着通州成为北京市行政副中心，北京城市规划中原先关于各个区县定位也将调整。会议确定，要按照城市战略定位的要求做好城市总体规划修改、“十三五”规划编制、主体功能区规划调整等工作，切实做到“先布棋盘再落子”。市里要统筹研究，明确各区县在京津冀协同发展中的角色和定位，以及在疏解非首都功能中的任务和责任。根据2012年北京公布的主体功能区规划，首都功能核心区包括东城区和西城区，城市功能拓展区包括朝阳区等，城市发展新区包括通州区、顺义区、大兴区（北京经济技术开发区）以及昌平区和房山区的平原地区，其余的生态涵养发展区包括门头沟区等。首都经贸大学城市学院首都经济研究所教授张贵祥认为，这次北京市行政中心从功能核心区搬向功能拓展区，对于北京多中心空间格局的建设、北京市整体的空间格局的合理化，有很重要的推动。北京市政府搬出东城区后，原先核心区的东城区和西城区可能合并，这主要是中央机构单位的城区，可以成为特别行政区域。赵弘认为，通州作为北京市的行政副中心，需要与周边河北香河，天津宝坻一同规划，该区域可以作为试验区。

国企改革年内再提速 顶层设计即将出台

央企改革提速 自去年7月15日，国资委宣布六家央企启动“四项改革”试点以来已整一年。虽然具体改革方案尚未正式公布，但在先行先试方针下，相关试点企业上市公司已跃跃欲试。6月以来，央企试点企业改革明显加速。截至7月14日，6家试点央企旗下23家A股上市公司中，有5家因筹划重大事项处于停牌状态。业内人士表示，从当前的政策和市场面来看，国企改革总体方案出台时机已成熟，预计下半年国资委将下发一揽子的国企改革方案文件，国企改革有望进一步提速，而央企改革作为国企改革的领头军，改革落地值得期待。中投顾问咨询顾问崔瑜表示，从这些上市公司动态来看，央企改革试点的进程已经开始加速。未来试点企业进行混改的主要方式是引进民营资金、PE、外资，搞活资产，创新机制，而上市公司将是混合所有制的重要实现形式；中粮和国投未来将从混合所有制改革、员工持股等方面推进国有资本投资公司的改革。财政部财科所国有经济研究室副主任陈少强表示，国家选择6家央企作为试点企业有其代表性，如果这些企业的改革方案正式公布，将对我国下一步国企改革有着重要的借鉴意

义，在未来的试点企业中，应着手考虑垄断型国有企业的试点问题，让混合所有制改革能够真正触及核心问题，混改要通盘考虑央企的意愿、非国有资本可能的投资领域、以及混合所有制带来的相关治理结构问题。多地国资委向企业放权 7月9日，国务院国资委发布《关于地方国资委调整优化监管职能推动完善国资监管体制的调研报告》显示，截至4月末，天津、上海、江苏等13个地方国资委已经制定履职事项清单，明确清单以外的事项由企业自主决策。向企业下放的审批事项主要包括主业内投资规划、产权管理、企业改制和部分领导人员管理等。7月8日公布的《天津市国资监管清单》减少了20%的监管事项。陕西、河北、江苏等地也从主业内投资规划、产权管理、企业改制和部分领导人员管理等四方面向企业放权。中国人民大学重阳金融研究院宏观研究部主任贾晋京指出，国资委向国企简政放权主要是确定企业的市场主体地位，激发企业活力，使其更能适应市场竞争环境。国资委主任张毅表示，国资委将带头进行自我改革，把该给企业行使的权力都放给企业，把不该企业负担的包袱都卸下来，切实增强企业作为独立市场主体的活力和竞争力。**地方混改应重点防止国资流失** 截至目前，已有北京、广东等超过20个省市国资委出台地方国企改革相关文件，混合所有制成为多地国企改革的着力点。上海国资在今年年初便明确了2015年的混改方向，即探索国资流动平台规范运作、推动集团公司整体上市。上海市国资委主任徐逸波表示，上海发展混合所有制的主要实现形式就是发展公众公司，推动集团公司的整体上市和核心资产上市。浙江省国资委提出，以资产证券化为主抓手，发展混合所有制经济。江苏、重庆、青海、黑龙江等省市也都明确提出了将采取市场化的混改方式。有分析认为，沉重的地方政府债务是国企富余存量资产出售的推手，理顺地方财税收支，防止国有资产流失将是下一步混合所有制改革的重点。据统计，截至2014年年底，央企和地方国企的资产总额分别为53.7万亿元和48.4万亿元。中国社科院金融所研究员杨涛认为，与央企相比，数量众多、区域和行业差异极大的地方国企改革，或许更具有复杂性。从方式上看，地方国资的整合途径包括收购兼并、股权划转，也包括实体资产出让等多种途径。从交易场所看，可以在地方产权交易中心、金融资产交易所等挂牌交易，也可以进行非公开交易。有国

资研究人员认为，与央企改革主要从增量着手不同，对庞大的存量进行改革可能是本轮地方国企改革的关注点，而以产权和股权挂牌等方式来实现资产的优化配置和增强国有资金效率，可能是下一步改革的重要方式。财政部财科所研究员文宗瑜指出，一方面，地方财政收入增长放慢和增幅回落，导致很多地方政府着手盘活存量资产，而这又牵涉到国有资产，一些对地方经济发展不是十分重要的国有企业可以通过国有股权、国有资产的出售来增加财政收入。另一方面，地方政府债务压力大，通过国有资产的出售和国有股权的转让可以筹集一部分还债资金。中国企业改革与发展研究会副会长李锦表示，在国企改革分类意见以及关于混合所有制、防止国有资产流失的方案还未公布的情况下，地方国企改革如果抢先进入跑道，中途夭折的可能性很大。地方国企改革与保增长、调结构三个焦点应该结合来看。过重地看待债务问题，仓促进行改革，快速进入调结构阶段，容易造成国有资产流失。张毅表示，在下一步国企改革过程中，要重点规范国有资产评估，完善国有资产定价机制，严格操作流程，确保公开透明，切实防止国有资产流失。

国务院六大措施促进外贸增长 推全国一体化通关

7月15日，李克强总理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部署了促进进出口稳定增长的六大政策措施，并强调“在扩大开放中增强发展动力”。全国口岸通关一盘棋会议确定，大力提高口岸通关效率，推动全国一体化通关，加快复制推广自贸试验区的贸易便利化措施，在沿海各口岸开展国际贸易“单一窗口”试点，加快出口退税进度。天津师大天津自贸区研究院执行院长刘恩波指出，“单一窗口”是自贸区推行的贸易便利化措施的一个内容。天津国际贸易单一窗口，就将海关、检验检疫、海事、商务等4个口岸部门和9个海港服务模块全都纳入平台。这可以实现一次申报、一次查验、一次放行，最大程度缩短通关时间，减少企业通关环节。全国通关一体化需要有“单一窗口”发挥作用，因为这涉及到各地海关关口如何征税的问题，但全国一盘棋后，各地口岸征税问题就自动解决了。。到今年5月，京津冀、长江经济带、“泛珠”地区、东北地区和丝绸之路经济带五大区域实现了区域内部通关一体化。到了7月，这五大区域之间实现了联网，这为全国

实现通关一体化创造了条件。这五大区域联网后，在一个平台上汇聚着海关、检验检疫、边检、海事等众多口岸部门的业务，这可以减少通关的时间，提高效率。商务部国际贸易研究院中国对外贸易部副研究员刘建颖指出，这一次加快复制推广自贸试验区的贸易便利化措施，主要还是要针对目前外贸增速放慢，今年以来外贸增长仍不如预期，通过这些推进措施，确保下半年外贸增长向好促进外贸稳定增长。海关总署公布的数据显示，上半年外贸形势仍严峻，上半年进出口总值11.53万亿元人民币，比去年同期下降6.9%。其中，出口6.57万亿元，增长0.9%；进口4.96万亿元，下降15.5%；贸易顺差1.61万亿元，扩大1.5倍。6月外贸出口先导指数为34.8，较5月回落0.2，这表明未来两三个月对外贸易出口压力依然较大。国务院常务会议在确定推动全国一体化通关，在沿海各口岸开展国际贸易“单一窗口”试点的同时，也提出了其他促进外贸的措施，包括，调整《鼓励进口技术和产品目录》及进口贴息政策支持范围；保持人民币汇率在合理均衡水平上基本稳定；鼓励金融机构开展出口退税账户托管贷款等业务；清理规范进出口环节收费；大力支持外贸新型商业模式发展等。有分析认为，官方选择六策并举，旨在对症下药、补短板，以提升贡献率偏低的外贸出口来确保全年经济发展目标顺利实现。《中国青年网》评论，六项政策项项都是“干货”，第一项是提高通关效率，以贸易便利化支持进出口增长；第二项是以进促出，形成倒逼机制，优进优出；第三项是人民币汇率“维稳”，帮助企业规避汇率风险；第四项是金融机构配合进出口，缓解融资难；第五项是为进出口减负，提高外贸企业获得感；第六项是模式再造，以新模式促进进出口增长。这六项政策围绕同一宗旨，都是用新一轮外贸支持措施，为外贸发展营造有利的环境，增强发展动力，用便利和稳定增长的进出口助力经济发展。国家信息中心首席经济师范剑平则认为，上述政策的出台更大程度上是适应中国对外开放新形势的中长期措施。外贸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实际上主要由顺差来体现。从外贸顺差扩大来看，今年上半年外贸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应该是高于去年同期的。国务院常务会议选择上半年经济核心数据发布当天专门出台稳定外贸进出口增长的重要措施，更多还是从长远利益考虑，从中国开始自贸区的试验以后，国家要实现更高水平的对外开放，肯定需

要在制度和政策上相应地进一步开放，有别于以往促进进出口稳定增长的政策举措。交行金融研究中心分析师刘学智认为，实施进口贴息加大高新技术产品进口，有利于国内产业技术水平提升。而保持汇率稳定，这对于外贸企业能稳定预期有关系。另外，现在贸易顺差增速高，人民币有升值压力，因此要做出稳定汇率的决定。人民币汇率是加大企业出口成本的另一个重要因素。截至6月30日，人民币汇率中间价对欧元、美元、日元分别较年初升值6.9%、0.2%和2.2%。范剑平认为，上述政策符合中国制造业发展全球竞争力的要求，未来中国不是靠人民币贬值来保持优势，而是要靠科技创新、降低生产成本、增加产品附加值。国际市场研究部副主任白明表示，面对内外环境的深刻变化，进出口企业转型升级意识增强。跨境电子商务、外贸综合服务企业、市场采购贸易等新型贸易方式降低了中小企业出口门槛，有利于发挥我国制造业大国优势，有望成为出口的重要增长点。由于今年上半年外贸形势不佳。有关部门下半年仍将继续推出新的政策措施。商务部此前分赴15省火线调研，还在近日召开了进出口商会外贸形势座谈会，分析2015年上半年重点行业进出口情况并研判全年外贸形势。商务部新闻发言人沈丹阳表示，商务部正在会同有关部门制定新的外贸促进措施，重点是帮助企业减负，包括进一步减免进出口环节各种收费，推进落实已定减免政策；更好地解决融资难和融资贵的问题；贸易便利化，改善营商环境，包括进一步出台跨境电子商务方面的政策措施。

观点精粹

赵坚：未来铁路投资重点不在高铁 而在通勤铁路

北京交通大学经济管理学院教授赵坚表示，随着靠大规模固定资产投资（主要是盖楼修路造城）来拉动经济的势头开始衰减，铁路货运量随之下降。这是因为盖楼造城需要钢筋水泥，生产钢筋水泥需要大量煤炭，中国铁路以运煤为主，煤炭产量下降铁路运量就会下降。在中国经济进入新常态后，煤炭产量会长期保持稳定或逐渐下降，铁路货运需求也必然随之下降，铁路的发展也要进入新常态。因此铁路也不能为加密路网而盲目规划，而要在科学的运量预测基础上适当建设。

因此，不能把投资铁路作为拉动经济的工具，铁路也会出现产能过剩。由于铁路建设的投资规模巨大，铁路的产能过剩比其他行业的产能过剩会造成更严重的损失。中国铁路未来的发展重点是大都市区的通勤铁路和城市轨道交通。大都市区是指以大城市为中心，由多个与中心城市有较强通勤联系的周边县及城镇组成的区域，其面积在 1.5 万平方公里左右。通勤铁路主要服务于通勤客流，并且通常是跨行政区划的。一条通勤铁路的长度在 30—50 公里左右，一般不超过 70 公里，在其车站周边应有高强度的房地产开发，这不仅能够为通勤铁路提供客流，而且可以使建设通勤铁路带来的土地升值收益回归建设主体。因而可以吸引社会资本采用 PPP 方式进行建设和运营。中国大都市区通勤铁路和轨道交通建设主要应由各中心城市负责，应与城市发展、土地商业开发结合起来循序渐进，不增加中铁路总债务负担，不留后遗症。城镇化是中国扩大内需的最大潜力所在，城镇化又存在不同的演化方向，集约型城镇化需要通勤铁路和城市轨道交通的支撑，通勤铁路具有塑造城市空间形态的功能。中国铁路的未来发展应当与集约型城镇化相结合，重点发展大都市区通勤铁路，走可持续发展之路。

杨涛：中国消费金融体系建设需要做好风险控制

近日，国务院常务会议决定，放开市场准入，将原在 16 个城市开展的消费金融公司试点扩大至全国，鼓励符合条件的民间资本、国内外银行业机构和互联网+企业发起设立消费金融公司。社科院金融研究所支付清算中心主任杨涛表示，在鼓励互联网消费金融发展的同时，也需注意其风险防范。包括美国在内的许多国家，都没有专门针对消费金融机构的监管规则，而是以功能监管的思路，着重围绕消费金融的业务品种进行监管，这也适应了混业时代的创新需求，有助于把握消费金融市场的风险与效率平衡。有鉴于此，中国消费金融体系建设也需做好风险控制。其中，一是加快推动信用体系建设，支持民营个人信用机构的发展，充分利用大数据的技术手段，积累有效的个人信用评价机制，与央行征信体系形成有效互补。同时，逐渐使得各类非银行消费金融机构、新兴金融组织与整个信用体系建设融合起来，使其能够有效利用各类信用数据库，同时提供更多的消费信用信息积累。二是对于非银行的消费金融提供主体来说，应该争取建立独立的

风险评估部门和完善的风险控制措施，同时有效管理消费金融业务，与其他主业进行协调定位，避免出现财务风险和流动性风险。三是充分运用各种风险分散手段，如保险和担保支持。保险业可以通过提供征信服务、小额信贷保险等来解决消费信用风险控制，担保同样为消费金融的发展提供专业化的风险防范机制。例如，现有的汽车消费信贷保证保险、助学贷款信用保证保险、小额信贷保证保险都对促进消费发挥着重要作用。四是有效监督消费信贷用途，建立奖惩机制，使得贷款人真正利用消费金融工具来进行日常消费，而不是把资金用作他途。作为保障，还需要从制度层面入手来完善消费金融发展环境。首先是构建系统的消费金融支持政策体系。其次，在吸取国外经验教训同时，努力构建适应国情的消费金融监管机制，以功能监管、差异化监管为基本思路，为防范未来消费金融扩张中的潜在风险奠定基础。还有，除了鼓励银行加快拓展消费金融业务、引导消费金融公司健康发展之外，还应该把基于互联网的消费金融创新作为重中之重。因为在小额、便捷、体验等方面，互联网消费金融产品可能会带给消费者更加有效的服务，也有可能运用大数据和信息技术来更好地管理风险和控制成本。当然，这一市场的发展还需要规范和引导，从而真正与银行和消费金融公司形成产品互补、客户互补、功能互补。

刘兴国：解决央企亏损问题是一项艰巨任务 需多方合力解决

中国企业联合会研究部研究员刘兴国表示，受当前经济下行压力影响，央企亏损面有所扩大。解决央企亏损问题是一项艰巨的任务，需要相关方面合力解决。首先，必须深入厘清央企亏损的原因，针对不同央企提出不同经营要求。解决历史遗留问题，需要政府承担更多责任，帮助肩负沉重包袱的央企走出困境；公益类央企由于需要更多承担社会责任，出现一定程度的亏损或许在所难免，对这类央企不宜提出太明确的减亏或扭亏要求；对那些由于企业管理层经营不善造成亏损的央企，则要适时调整管理班子或进行经营管理改革。其次，深化改革是央企解决亏损问题的唯一出路。积极深化改革，一要增收，二要节支。从增收的角度看，经营不善的央企，一是应及时调整产品结构，生产适销对路的产品；二是积极进行并购重组，出售亏损业务，购入具有较好盈利能力的资产，整体提升企业

资产质量；三是加强企业销售力量，扩大产品市场覆盖范围；四是不断研发新产品、创新商业模式，有效增加产品附加值。从节支的角度看，亏损央企应减少企业运营所需的费用支出，降低资金使用成本，并进行组织结构变革，简化管理层级，裁减不必要的部门与人员，提升组织运行效率。同时，还要强化国有资产保护，严防国有资产流失。再次，央企减亏需要相关部门做出相应制度创新安排。国资委前几年推动的并购重组在快速做大央企方面取得了显著成效，却也在一定程度上刺激了央企粗放、低效的扩张，加剧央企资产质量恶化。因此，应从根本上改变央企监管模式，从具体的人、财、事监管转向对国有资本的监管，让央企拥有更大的经营自主权；应进一步完善央企考核体系，建立基于盈利能力、创新能力与长期增长能力的考核体系；应加快推进混合所有制改革步伐，加快完善央企内部治理机制，在建立现代企业制度的基础上，进一步增强央企的灵活性与活力；应鼓励央企实施员工持股计划，最大限度激励员工积极性与创造性；应进一步完善并落实国有企业退出机制，允许央企按照有关规定做出合理的减员增效安排。最后，央企扭亏也需要一个公平竞争的市场秩序。假冒伪劣产品的泛滥、专利与商标侵权事件的频发、违法经营行为的普遍存在，都在一定程度上对央企的守法诚信经营造成冲击，这在钢铁行业表现得尤为突出。因此，政府相关部门必须加强市场监管，大力查处违法违规经营行为，营造规范有序的市场环境。

(未经许可，请勿转载)

总编审：任朝霞

责任编辑：袁雅瑾 赵祺馨 王雪瑶

联系人：陈新孙 杨宇 电话：(010) 68558515 68558583 13910382901 传真：(010)68558341

Email: cxinsun@cei.gov.cn yangy@mx.cei.gov.cn 准印证：京内资准字 1415—L0140 号
